

#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冯雪峰

□汤志辉

与此同时,《人民日报》上开始报道批判冯雪峰的消息与文章。8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头版,刊发了《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》,彻底将冯雪峰打入另册。8月28日刊发了何其芳在16日会议上的发言稿《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》,文章称:“原来三十年来混在党内的冯雪峰是这样一个反党分子,这样一个个人野心家!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,他不惜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原则。他可以抛开上海的党组织,依靠胡风那样一些人去进行分裂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活动。”并从文艺思想和作品方面,解读了冯雪峰的反党思想。9月1日发表了田间的《是什么理论家?——读冯雪峰的“寓言”有感》,对冯雪峰的寓言创作进行了批判,文章称“他的某些所谓寓言,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宣言。他们向党向人民挑了战。我们一场重大的斗争,正在进行中。作家们,必须给这些挑战者以回击!”

在各方压力之下,冯雪峰在9月4日第25次大会上,深刻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罪恶。其中首先就检讨了1936年在上海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宗派活动的错误,这也是对冯雪峰批判最严重的地方。其他关于与胡风、丁玲等关系也作了检讨。他检讨:“在根本上,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,自我中心主义者。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和思想和情绪。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,使我对社会、对集体、对党,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,我轻视思想改造,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;这样,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,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,同党的要求,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,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。我入了党,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;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。我始终执迷不悟,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,却要求党适合自己,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。这样,我同党的关系,可以用一句来概括: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,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。”(《冯雪峰全集》第9卷)对冯雪峰的检讨,大家比较满意,检讨后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,大家也认为他的检讨比丁玲、陈企霞、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。1957年召开的一系列作协党组扩大会议,一方面是配合文艺界的反右运动,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文艺界执权者利用反右运动,排除异己力量,30年代以来左翼文坛上的宗派主义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坛。冯雪峰的受批判与被打成右派分子,与这种宗派主义有很大关系。

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“大鸣大放”中的现行问题。“反右”之前,党开展了整风运动,号召大家“大鸣大放”,对党的工作不满意的地方提出来,并积极鼓励大家提改进的建议。冯雪峰是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,他在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时,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。据1957年5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的专稿《对出版事务“统的过多”“管的过死”各出版社负

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》显示,在座谈会上,冯雪峰认为,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,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,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,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。他说,按着正常的道理,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。但目前印刷、出版、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,事实上形成了“发行领导出版,印刷控制出版”的局面,“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,又不像企业单位,好像似衙门”。这些言论在进入“反右”运动后,就都成了“现行罪行”。

关于冯雪峰在整风期间的“现行罪行”还有很多。在1957年8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打倒冯雪峰的文章中,就称冯雪峰是“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‘青天’”,据王任叔、徐达等揭发:在大鸣大放期间,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,他兴奋地说:“洪水将冲破大门。”他一反平常的沉默、抑郁的状态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,向党发动进攻。

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分子后,很多人不敢相信,甚至为他抱不平。杜鹏程曾获得冯雪峰帮助,他的《保卫延安》就获得冯雪峰的赞赏,他在得知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,忧愤交加,在《雪峰同志和(保卫延安)》一文中描述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:“记得反右斗争的后期,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,任务是把全国作协反右斗争情况带回来向同志们传达。我们一去就参加大会。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。坐在我身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给我说:冯雪峰是他们的社长,在他们那里过党组织生活,可是把他定成右派,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全不知是怎么回事;有的同志听到这事之后甚至哭了!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,其荒谬可笑,使人难以想象。”

别人替冯雪峰抱不平,那么,冯雪峰在被打成右派后,他自己是怎样的呢?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抑郁和苦闷。王士菁在《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》中记述了冯雪峰当时的情况:“有时我上苏州胡同一六号他的宿舍去看他,他躺在书桌旁边的藤躺椅上,脸色铁青,半天不说一句话。后来,王任叔同志告诉我,雪峰同志当时的确曾想到过要毁灭掉自己。”但是很快,冯雪峰就投入到工作当中,他没有怨艾,不卑不亢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一名普通编辑。胡愈之在《我所知道的冯雪峰》中说:“雪峰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,跟我没有中断来往,不过很少走动了。以他那样的脾气,在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处分以后,对党没有怨言,也不自轻自贱,表现沉着而冷静,仍然一如既往,热心党的文艺事业,继续研究鲁迅,和我见面的话题都是关于文学研究方面的,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”他编辑《郁达夫文集》,写出《郁达夫生平事略》和《郁达夫著作书目》,又继续编选1918至1949年的《新文学三十年集》中的短篇小说部分。利用业余时间,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。到1961年12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通报全国,摘去他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

往是模糊的、简单化的,从而削弱了抒情的深度。

“美”是冯雪峰诗歌的关键词,也是其诗歌的“内核”所在。在《灵山歌》中,几乎每一首诗都会出现“美”,豪美、秀美、慧美、远美等,构成冯雪峰诗歌的核心美学诉求。或可以说,正是“美的引领”,使得冯雪峰得以超越那血淋淋的监狱现实,而始终将希望与理想寄托于彼岸,这既是炼狱中淬炼出的火焰,更是灵魂深处飞出的希望:“从我空洞的灵魂的深处,飞扬出美的曙光”!这里的美,既是自然的,也是灵魂的(伟大的不屈者的美姿);既是历史的,也是未来的(远美)。它是冯雪峰在狱中的想象性远景,更是其革命情怀的具象化呈现。在血淋淋的革命现实中,冯雪峰的《灵山歌》没有悲哀和抑郁,而是在对“力与美”的想象与颂扬中,传达某种不屈的斗争精神,这既是一个战斗者的精神使然,更是一个诗人独特的诗歌观使然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冯雪峰的人格与诗格是高度合一的。

## 四

《灵山歌》中以《雪的歌》为代表的诗歌,扭转了其早期诗风,以凝练厚重的诗思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情愫,完成了对其早期诗歌写作的超越的同时,为中国新诗史贡献了佳作。我们看到,作为诗人的冯雪峰,虽然其诗作寥寥可数,但他的诗歌观以及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,使其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。特别是在1940年代的战争语境中,他的诗歌虽然难以避免二元对立式的诗歌书写模式,但其充满主观诗色彩的意象、物我合一的抒情方式,使其与流行的左翼诗歌拉开了一定的距离,进而避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。

在一首题为《普罗米修斯片断》的短诗中,冯雪峰写到:“忍耐是不屈,/而愤怒是神圣,/顽强简直是天性!”普罗米修斯因为盗取了火,送给人间而遭到宙斯的惩罚,被关押在高加索山上。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,冯雪峰获得了高度的自我认同。盗取天火,为人间带来光明,带来智慧,带来力与美,这是信仰与志趣。故可以说,《“灵山歌”中的作品事实上秉承了中国传统‘明志诗’的传统,而这一点正是《灵山歌》区别于通常意义上左翼‘政治诗’的地方。”(陆耀东:《中国新诗史》第三卷,第313页,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)于是,在《灵山歌》的字里行间,我们看到了他充满激情的志向,看到了那炼狱之火中冶炼的新的自我。

《灵山歌》,冯雪峰在狱中明志,以诗歌之火淬炼自己的不屈灵魂。

# 《灵山歌》:冯雪峰的“狱中明志”

□马春光

虚”是其必须面对的,如果我们在诗歌中按图索骥,就会发现他这一时期的内心现实。在一首颇具象征意蕴的诗歌《孤独》中,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人口得以窥见当时他的心态状况:

哦,孤独,你嫉妒的烈性的女人!  
你用你常穿的藏风的绿呢大衣  
盖着我,  
像一座森林  
盖着一个独栖的豹。

但你的嘴唇滚烫,  
你的胸房灼热,  
一碰着你,  
我就嫉妒着世界,心如火炙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首诗是非常个人的,它异常强烈地传达了狱中生活的苦闷与压抑。这大概是冯雪峰诗歌中情感最为浓烈的一首诗,有着强烈的象征派派的风格。感情之强烈,抒情主体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之紧张,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但这显然不是他上饶时期最典型的诗歌。与其说,冯雪峰的身体在上饶集中营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,毋宁说,他在这里经历了一场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炼狱。在“孤独”中,不断孕育着新的自我。这是一种对“虚无”的测量,对“自我”的叩问:

怎样的奇迹呵——  
当我袭击着空虚,  
当我深入黑暗的阵地,我碰见了我自己!

我于是俘获了我自己!  
我于是根据自己心头的疼痛,  
计算着我对空虚的撞击有多么重!  
于是,书写这个“自己(自我)”的孕育与形成,展示新的自我所具有的革命志趣,就成为这一时期(乃至后来编选诗集《灵山歌》)最核心的诗学任务。

## 二

《雪的歌》是《灵山歌》中最长的一首诗,同时也是冯雪峰所有的诗歌中篇幅最大的一首。《雪的歌》共6节,约200行。全诗以“雪”为抒情主体,以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,表达了诗人异常激烈的革命斗志。全诗充满了奇异化的浪漫想象,潜在地表达了冯雪峰的革命观。

“雪”是一种经常被赋予深刻内涵的自然景物,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有丰富的美学积淀。在冯雪峰之前,以“雪”

为对象的名作就有鲁迅的散文诗《雪》(1925),徐志摩《雪花的快乐》(1925)、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(1936)。冯雪峰的这首诗除了在篇幅上更大之外,更重要的在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主观精神。

第一节第一行连用两个“暗黑”,“暗黑的天空”、“暗黑的地上”,其实是在渲染一种氛围。暗黑的社会氛围中,白色的雪构成对这种恶劣环境的一种反叛和冲击。在这种颜色的鲜明对比中,“我”得以最大限度地凸显。所以,总体上讲,第一节既是写实的,更是象征的。表层上书写了雪降落的环境与过程,其实在深层上是抒情主体的“自我言说”。这样,环境越是恶劣,雪——“我”就越悠闲自在地降落。

《雪的歌》用如此大的篇幅,并没有细腻地刻画写雪的形象,而是凸显一种主观的诗学,重在表达“雪”给大地、人类带来的升华。冯雪峰运用“我”的第一人称抒情方式,这其中隐含的是“革命主体”的身份:“那虽囚居在暗室里/而他的智慧的勇敢的光仍能探索世界的人。”这两句诗既是诗人的自况,更是诗歌抒情主体的高扬。诗歌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次第展开,在空间上,诗歌通过繁复的句式极写“雪”给“大地”带来的生命的律动和冲击,雪触及大地的每一寸肌肤,给它们带来律动与生机。雪还对于那些勇于探索的人营造梦境。在时间上,于雪的落下,到雪与大地的接触,最后写太阳出来,春天到来,雪的消融构成了本诗的顶点,同时也是雪的完成——这更是抒情主体之“自我”的完成。至此,我们看到,在雪的飘黏、改收、拥抱、消融等一系列的过程完成的同时,抒情主体的想象化的“自我”升华也得以完成。

冯雪峰的这首长诗,在对雪的浪漫化抒写与表达中,隐喻了革命自我的内在志趣。饶富意味的是,冯雪峰关系紧密的鲁迅和毛泽东在这之前都写有关于“雪”的诗作,鲁迅的散文诗《雪》在对朔方的雪的状写中表达了一种独立与张扬的革命精神,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则以宏大的雪景为寄托,抒发了 一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。冯雪峰的这首诗试图糅合它们各自的特色,但不同的是,“雪”与“自我”在《雪的歌》中的高度融合,以及其“救世主”般的浪漫化营

冯雪峰一生著述颇丰,但其诗歌作品并不多。如楼适夷先生所言,“在他一生勤奋的写作生涯中,写诗的时间只占据极小的比例,留下来的诗篇也寥寥可数。”(《楼适夷:《诗人冯雪峰》)冯雪峰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,“湖畔”时期和“上饶集中营”时期。前者主要收录于1922年出版的《湖畔》与1923年出版的《春的歌集》这两部诗歌合集中,后者收录于1943年出版的《真实之歌》中,后来冯雪峰对其进行了删减、精选,1946年以《灵山歌》为名出版。

诗集《灵山歌》收入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中所写的诗歌17首。与其“湖畔”时期的诗歌相比,这些诗歌最明显的特征在于,诗歌的容量有所增加,其中不乏一些长诗,这在冯雪峰以前的诗歌中是不常见的。

## 一

《灵山歌》中的诗歌写作于1941—1942年之间,这时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。值得注意的是,1925年之后,冯雪峰投身革命,他基本上已经中止了诗歌写作。在狱中,他重新拾起久已搁置的诗笔,开始诗歌创作。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日子,他自称“最灰暗的日子”,这些诗“应该看作他最重要的作品”。只是,这时的诗歌,已经与“湖畔”时期有了截然不同的思想意旨与艺术范式,周良沛说,“雪峰两个短暂的诗的时期的作品,一眼看来,色调的反差很大”(周良沛:《中国新诗库·冯雪峰卷》卷首),可谓之诗歌的转变。

冯雪峰为什么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中断了诗歌的创作?他又为什么在狱中重新进行写作?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

与当时流行的左翼诗歌相比,冯雪峰的诗歌观是独特的。在冯雪峰那里,诗是与生命同源的,他从来没有刻意地去经营诗歌。所以,诗歌在他那里,从来都是真正来自灵魂的需要,是他最隐蔽的心灵表达路径。“我住在和人们隔离的荒凉山野中的病院里,我远隔朋友和亲人,病虽未至死,那时的诊断确实没有痊愈之期。因此,我的心境早就变成非常的早。有时简直想狂呼暴跳,以使生命早日消灭。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,极力使自己平静,而结果便是更无聊,毫无生趣的日子。在这样的日子,我以写诗消遣……”(冯雪峰:《雪峰文集》)这段回忆为我们阐明了他再次从事诗歌写作的内在因由,那么,在这样的个人困境中,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诗呢?在个人的不幸与国家的创痛中间,冯雪峰选择以何种姿态发言?很显然,这一时期的冯雪峰,其诗歌写作的内在心理机制是异常复杂的。“孤独”、“空